

# 产业转型与文化再造:特色小镇的创建路径

周晓虹<sup>\*1</sup>

**【摘要】:**从2014年甚至更早开始,一种肇始于浙江、以区域性空间再造和增长要素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模式——“特色小镇”横空出世,并迅速推向全国,这一区域性实践在中国城市化和产业转型方面具有多方面的推广和辐射意义。特色小镇的创建既是一种优化生产力布局、注重内涵的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破解有效供给不足、推动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经济模式,还是一种多元参与、体制开放、协同共享的社区或社会治理模式。同先前包括开发区在内的诸种发展模式相比,特色小镇建设这种受产业驱动的现代区域增长模式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恐怕就是将文化的创新和再造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一特征使得传统上一直以文化见诸于世的江浙注定会共同上演一场引人瞩目的产业转型的“双推磨”。

**【关键词】:**特色小镇;产业转型;社会治理;文化再造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7)04-0012-08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7.04.002

从21世纪开始,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中国的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走向前台。在此背景下,一种肇始于浙江、以区域性空间再造和增长要素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模式——“特色小镇”横空出世,并迅速向全国推进,进一步丰富了十六大提出、十八大确定内涵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 一、区域实践与辐射意义

从2014年甚至更早开始,浙江根据自己拥有大批块状经济即区域特色经济的特点,开始探索新型的城市化和产业发展道路,形成了一批“相对独立于市区,具有明确的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功能、社区特征的发展空间载体”,并因杭州云计算产业生态小镇——云栖小镇的引人瞩目而催生了“特色小镇”这一后来流行的称谓。<sup>①</sup>2015年1月,在浙江省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色小镇作为关键词被提出,其重要性被提高到新一轮更大范围的战略布局中。随后,浙江省政府公布了《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并先后公布了包括业内脍炙人口的上城玉皇山南基金小镇、西湖云栖小镇、乌镇互联网小镇在内的两批79个特色小镇。在这一过程中,浙江一直将特色小镇的建设视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是经济新常态下加快区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sup>②</sup>

作为战略选择,特色小镇的规划与建设标准是具体而严格的。根据浙江区域经济的特色和优势,这个“相对独立于市区”但交通便利,同时“区别于行政区划单元和产业园区”的空间发展平台,规划面积一般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建设面积控制在1平方公里左右,是一个集“产、城、人、文”于一体的综合型社区或以创新、创业为目的而聚集的人群共同体。产业不仅决定了这一发展平台的前途或未来,也赋予其独立于世的“特色”,由此决定了特色小镇的产业聚焦于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

---

<sup>1</sup> 作者简介: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江苏紫金传媒智库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南京 210093

本文系作者2017年3月1日在江苏省发改委、新华网和江苏紫金传媒智库主办的“2017:江苏特色小镇论坛”上的讲演,发表时做了进一步的修改。

、高端装备制造七大朝阳产业，以及包括茶叶、丝绸、黄酒在内的浙江历史经典产业(即所谓“7+1”产业)；③ 为保证产业特色和竞争优势，这一创业创新平台应该对高校毕业生、企业高管、科技人员和留学归国人员即所谓“新四军”们具有吸引力，因此决定了特色小镇的创建要赋予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从创业者的价值观、文化认同直至镇区的文化表现形式；与产业特色相呼应，所有特色小镇的生态与环境建设标准应都不低于 3A 景区(旅游特色小镇要达到 5A 景区)，因其着眼于人才的吸引和驻留，因此这完全能够与旅游景区相媲美的小镇，却不设旅游人数与收入等考核指标；为实现上述诸项目标，特色小镇根据行业特点，原则上要完成不包括住宅和商业综合体在内的“有效投资”30 亿或 50 亿。浙江的实践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尝试，比如实行“创建制”，重谋划、轻申报；转变政策扶持方式，从“事先给予”改为“事后结算”；在空间上，避免新的城市病，以人性尺度规划镇区，强调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融合”，为高端创业者打造“十分钟工作生活圈”，真正使其成为创新创业的发动机和共享空间。

纵观浙江“特色小镇”建设，我们起码可以从以下五大方面理解其在中国的城市化及产业转型方面的推广辐射意义：(1) 在中国城市化不断推进，但与此同时大城市过度超载、城市建设千篇一律、城市治理简单粗放、各种城市病蔓延丛生的背景下，④ 在城乡结合的部位切割出体量不大但富有特色的区域进行量身定做、产业扶持、文化再造、精准治理，为中国的城市化找到了一条富有活力的选择性路径；(2) 通过在较小的空间尺度范围内聚集高端朝阳产业，且以创新驱动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动力，既破解了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大多数发达地区的空间资源短缺问题，又有效地通过产业转型推动了现今如火如荼的供给侧改革；(3) 通过高端特色产业的聚集、包括“创建制”“期权激励”及“追惩制”等在内的各类政务和服务创新机制的推行，尤其是“三生融合”的绿色生态环境的打造，强力吸引高端创业者、风投资本、各类孵化器聚集，为越来越多的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找到了创新创业的热土，实现了诸种高端要素的超常聚合；⑤(4) 通过各类高端与传统产业、生态环境、生活社区尤其是创业者的融合，形成了急需“社会精准治理”的新秩序空间；⑥(4) 从形式上看，这一新型空间“产、城、人、文”四位一体，“既云集了市场主体，又强化了生活功能配套与自然环境美化”，⑦而从精神上看，这一人群共同体的聚集方式又以鲜明的社区归属感为标志，人们在此频繁互动、相互砥砺，并因此形成了具有一定强度和数量的心理关系，这种主体性和人际网络不但为技术创新也为社区“精准治理”提供了可能；(5) 通过“小而美”和“小而精”的空间打造，尤其是通过各类高端朝阳产业和资本的引入，不仅为成长中的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大显身手的空间，也为这一新社会阶层的壮大提供了成长的路径；可以设想，特色小镇将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实现“中产”梦想的踏板。

正是基于特色小镇的活力与创新，浙江的区域范围内的改革实践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好评与呼应：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先后批示推荐浙江的特色小镇经验；2016 年 7 月，国家住建部、发改委和财政部也联合发文，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小城镇培育工作，力争在 2020 年培育出 1000 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至此，一场围绕新型城镇化和产业转型升级而展开的小镇建设运动在上海、广东、福建、山东、安徽，尤其是在与浙江毗邻的江苏拉开大幕。

## 二、从开发区到特色小镇：区域开发、产业转型与社会治理

特色小镇这种围绕特色产业形成的创新创业的现代群落在浙江开花并不是偶然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因囿于工业基础的薄弱、资金的匮乏、公共财政的拮据，尤其是耕地面积的紧张，浙江许多地方形成了以分散的家庭经营为单位的经济格局，“温州模式”就是其中的代表。⑧温州模式甚至整个浙江的经济都具有块状经济或县域经济的特点，如温州鹿城区的鞋帽、服装和打火机，永嘉桥头镇的纽扣，义乌的小商品和海宁的皮革都闻名于世。1984 年后，兴建开发区及类似的工业园区或产业园区，成为包括浙江在内的各地实现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路径，杭州下沙开发区、绍兴柯桥开发区、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及义乌工业园区都闻名遐迩，它们和中国数千家各级各类开发区一起，为中国 GDP 的增速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⑨

其实，“从块状经济、县域经济，到工业区、开发区、高新区，再到聚集区、科技城，无不是试图用最小的空间资源达到生产力的最优化布局”。⑩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深化，在经济绩效方面具有极大优势的开发区模式受到挑战：从外部来看，中国的城市土地经过高强度开发，供应瓶颈已日益凸显；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开发区逐步城区化，公共服务不足矛盾突出；由于同时兼具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不仅导致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容易引发腐败，⑪而且政府在政府大包大揽的同时，也压抑了市场主体的主动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特色小镇的城市化与产业发展模式,正是在开发区模式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且中国经济开始从高速增长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诚然,特色小镇的模式在国外早有尝试,早在1898年,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就提出过“花园城市”的设想,希望通过将新的工业增长外迁,“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sup>②</sup>解决伦敦城的盲目扩张。尽管后来在具体的实践中,“大多数美国花园城市因为缺少它们自己的产业,因而和……中产阶级郊区的住宅开发差不多”,<sup>③</sup>但因为战后非大都市地区制造业就业人口的增长,在美国中西部还是有许多小镇发展了起来,<sup>④</sup>也出现了一些以社区为基础的企业(communitv-based enterprise)。<sup>⑤</sup>同时,一些以专业化为导向的小镇,如美国的硅谷(高新产业)、格林尼治(对冲基金),法国的格拉斯(花卉及香水业)、依云(旅游疗养),德国的沃尔斯堡(大众汽车城),以及丹麦的卡伦堡(工业共生与循环经济)也都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产业和运营模式。但是,西方的经验,或者说上述将城市化和产业化精妙融合的发展模式,只是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今天,才能够引起处在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中国的管理者、企业家和创业者的关注,也才能按照我们的资源和人才特点选择或对接进我们的发展洪流之中。从最初上海新天地和田子坊、北京三里屯、南京1912、成都宽窄巷子等旧街区(这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城中镇”)的改造,到近来浙江等地的大规模小镇实践,上述选择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起码蕴含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特色小镇的创建是一种优化生产力布局、注重内涵的区域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在一个“总面积3平方公里左右,核心区面积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将产业、文化、旅游以及社区功能融合在一起,避免了过去开发区建设的“摊大饼”的粗放经营方式。在浙江样本以及江苏制定的《指导意见》中,都一再重申“特色小镇是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聚焦特色优势产业,聚集高端发展要素,不同于行政建制镇和产业园区的‘非镇非区’创新创业平台”。<sup>⑥</sup>这一平台或聚落的建立,旨在打破传统产业或企业间的隔阂,形成产业、人才、资本、文化和环境的重新组合,并通过这种组合创造出新的机会、激发出新的功能。<sup>⑦</sup>

实践者们所以将这一平台或聚落定义为“特色”,是希望通过特色的产业、特色的环境、特色的文化和富有专长的特色人才,赋予小镇以独特的竞争力。早在198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提出过“小城镇,大问题”,尽管其关注的是建制镇“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sup>⑧</sup>的问题,但他以吴江为例提出的小城镇类型,如盛泽(丝绸)、同里(旅游)和平望(工业疏散)等,已经触及小城镇以“特色”立足的想法。在当时的背景下,人们公认:“对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实现政府的其他目标来说,复苏中的小镇是一辆快速汽车”。<sup>⑨</sup>其实,当下特色小镇建设强调“特色”,不仅点明了浙江范围内的区域实践的成功之道,也是申明在其他省市或地区借鉴这一发展模式之时,不能单纯模仿,而应根据自身的经济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整合、创新、再造。以江苏为例,其《指导意见》中的产业集聚是“6+1”,但却突出了江苏基础雄厚的高端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现代农业,旅游风情小镇也强调要“突显浓郁苏派风情和人文魅力”。<sup>⑩</sup>

其次,特色小镇的创建是一种破解有效供给不足、推动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经济模式。作为特色小镇发源地的浙江,自改革开放以来,由家庭工商业和私人企业为主形成的各类块状经济,促进了浙江从资源小省迈向制造大省和市场大省。但是,长期以来浙江制造业所以能够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低成本一直是其核心竞争力。而近年以来,随着能源、设备甚至人力成本的大幅攀升,“步入新常态的浙江制造,并没有从‘微笑曲线’底端走出来,产业转型升级滞后于市场升级和消费升级,导致有效供给不足和消费需求外溢”。<sup>⑪</sup>在此背景下,特色小镇的创建,通过导入最有基础、最有特色、最具潜力的主导产业,也即前述包括信息经济、高端装备制造在内的“7+1”朝阳和传统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浙江的产业结构,推动了浙江制造供应能力的提升。比如,宁波的“宁海智能汽车小镇”“江北动力小镇”“余姚模客(模具)小镇”,都因为先进制造装备、资金和人才的引进,重振了“宁波制造”的雄风。

经济总量占全国GDP超过10%的江苏,制造业规模大,在全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浙江相似,在实力雄厚的江苏包括领先的苏南制造业中,依旧是传统产业占比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基地并不多,其产业升级和改造同样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是,江苏科教人才资源丰富、技术创新平台众多,加之经济基础雄厚、公共财政丰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产业升级改造也有诸多优势。此番特色小镇建设,就为江苏经济聚集各类高端要素,促进产业链、人才链、资本链和创新链在空间上的紧密耦合,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一条可能之路。事实上,从世界性的经验来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制造业产业集群不仅能够创造大量的生存

型的就业机会,而且通过经济聚集能够为进一步的产业发展和产业转型铺垫温床。<sup>②</sup> 塔如此,在这一维度下,江苏特色小镇的发展有两个向度至关重要:其一,要关注《指导意见》所聚焦的“6+1”产业,尤其是切实提升高端制造业的水平;其二是以产业融合为导向,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力争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甚至现代农业的协同发展。

再次,特色小镇的创建还是一种多元参与、体制开放、协同共享的社区或社会治理模式。我们知道,我们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是1949年后60余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它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这一管理体制既具有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强的特点,但它在赋予国家和政府巨大权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企业和社会的生存与行动空间,带来了底层活力不足、封闭性强、政府负担日益加重的弱点。<sup>③</sup> 即使在改革开放时代出现的各级各类开发区,一方面其“管委会-开发公司”的组织构架能够有效整合和动员各类经济、社会要素,另一方面其整个的运行过程依旧是政府引领、市场和社会主体追随,市场机制服从于政治机制。<sup>④</sup> 这不仅导致了市场主体的过度依赖与活力不足,也使管理者只着眼于经济指标、对提供差异化的优质公共服务兴趣寡然。

坚持市场主导、多元主体的特色小镇则不然。因为其既不属于某级行政建制,也不是准政府形态的开发区,反倒使其能够发挥联结政府、市场与社会的纽带功能,“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要求,创新建设管理机制和服务模式,提高多元化主体共同推动特色小镇发展的积极性”。<sup>⑤</sup> 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下,政府不再直接介入大规模的建设与投融资工程,也不再对旗下公司的日常业务和发展难题大包大揽,而是回归制度保障、公共服务和环境改善,做好规划编制、设施配套、文化建设、生态保护、资源要素保障等公共性事务,此时政府不仅不再是“厂商”,也不再兼有开发区时代的“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政府的“去法团化”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区隔政府的“公权力”与市场的“私行为”,降低权力滥用的风险。<sup>⑥</sup> 尽管要真正摆脱传统的思维和管理模式并非易事,特色小镇治理模式的出现毕竟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sup>⑦</sup> 提供了一种尝试路径。

### 三、文化的再造与社区共同体的重塑

如果说特色小镇的建造是一种受到产业驱动的现代区域增长模式,那么这一模式同先前包括开发区在内的诸种发展模式相比,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恐怕是文化的创新与再造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在浙江的实践中,在这个集“产、城、人、文”于一体的发展平台中,“文化是特色小镇的‘内核’,每个特色小镇都要有文化标识,能够给人留下难忘的文化印象”。<sup>⑧</sup> 特色小镇的创建之所以强调“文化”的再造,一方面说明一如有特色的产业才能够具备市场竞争力一样,有特色的文化才能够赋予小镇这一人群共同体以独特的认同感或内在的灵魂。在美国诸多大学城的发展过程中,“学院的教授、行政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员,皆因为大学赋予了小镇以独特的文化调性而为其所吸引,并将其视为理想的居住之所”。<sup>⑨</sup> 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中国经济摆脱了贫困落后,摊大饼式的单纯复制已经越来越满足不了逐渐差异化的人群的差异性需求,而文化的再造恰是供给侧改革的良方之一。

近100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敏锐地看到了经济或市场因素在现代城市形成中的作用,由此提出了一种有关城市的“理想类型”:即城市这一人群共同体首先必须具备一个市场作为其中心制度,在市场之外,一座城堡或某一特定的区域、一个至少是部分自主的法律系统和行政系统,以及一种反映都市生活的特殊面貌的社群(association)形式。<sup>⑩</sup> 璠在这里,这种奠基於经济与商业制度之上的城市类型,已经隐约含有某种文化面向。此后,在芝加哥社会学派那里,城市的文化及其居民的社会心理获得了进一步的重视。“将城市作为一间社会实验室来思考”的罗伯特·帕克,一直以为“每一个社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互依赖的文化单位,有自己的判定什么合适、什么得体、什么值得尊崇的标准和看法”。<sup>⑪</sup> 璠由此进一步解读的话:(1)显然,在共同的生活实践中,在城市这个区域中活跃着的各式各样的群体,必然会分享共同的交往模式和社会地位,并因此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生活与行为方式和特色鲜明的物质表现形式,他们一样会为自己生存的城市留下独特的精神气质、文化品位、艺术作品以及民间与口头传说;(2)现代都市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恐怕就是它与生产和消费这类经济过程有着本质的联系,与此相应,银行和办公大楼、饭店、商场、俱乐部、图书馆、电影院、博物馆、展示中心、餐馆、咖啡馆、公寓、会议中心、市政广场以及跑马场、

教堂，代替了先前的宫殿、庙宇、金字塔、天坛、纪念堂和宫苑，成为最具文化意义的都市象征。<sup>⑩</sup>

回到我们讨论的特色小镇。文化的再造过程既有传承、借用，也有杂糅、创新。传承的因素可以来自本土的口述历史、特色产品、风土人情、田园风光、人文空间(如庙宇或故居)，借用的因素可以来自外域的建筑风格、时尚观念、流行品牌、现代工艺、编码或解码技术。简单的杂糅，可以将不同的文化要素重置于同一空间之下，通过各式文化功能的叠加，以万国之美博揽群眸；而复杂的创新，则可以通过各种文化要素的重组取得新的构型，或凭借新要素的淬炼达成人文之大美。在特色小镇的建设上，瑞士达沃斯、法国普罗旺斯、德国梅尔斯堡、美国的格林尼治乃至中国的乌镇这些先行者们的成功，让越来越多的人希冀能够像海德格尔所说“诗意地栖居”，但仿制者们却很少有人知道，文化才是诗意的内核。如果说有时资本的流入和税收的优惠就能造就产业的聚集，那么文化的再造则需要时日。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打磨”工艺，而打磨的器具就是“精耕细作”加上“经年累月”。

我们强调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文化”的重要性，但却想郑重申明：在这里，文化不仅具有享用(对小镇的居民)或展演(对游览者)的性质，更具有精神上的砥砺功能。简言之，我们所说的特色小镇的文化，包括了各式各样的令人流连忘返的物质表现形式，但同样甚至更应包括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群共同体或创业平台，特色小镇起码应该具有三种分析尺度：(1)物理尺度，它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地理区域；(2)社会尺度，在该区域内生活或工作的居民存在着相对频繁的交往或互动；(3)心理尺度，小镇的居民有共存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即他们有着鲜明的社区意识。<sup>⑪</sup>

在这里，最能够体现社区意识的应该是小镇成员的社会归属感。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特色小镇的形成有赖于一群人因其所投身的产业而聚集在特定的区域，但更有赖于人们之间的互动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强度和数量的心理关系。特色小镇如果有持续的影响力，就像美国的硅谷从1930年代扬帆起航，一直到现在都独领风骚一样，就必须形成鲜明而强烈的社区归属感，而影响归属感形成的因素包括：(1)社区成员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满意程度：就特色小镇的创建而言，3A级景区以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是高端创业要素尤其是人才要素聚集的前提条件；(2)社区成员的认同程度：这种认同感是特色小镇的创业者们形成归属感的前提和组成部分；(3)社区成员在小镇内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能够使得投资者、管理者和创业者们在日常交往中获得感情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能够相互激励和启发，获得创业创新的灵感；(4)社区成员在小镇内的居住年限：显然，居民在社区内的居住年限越长，其社会关系就越广泛、越深厚，因而其社区归属感就越强；(5)社区成员对小镇活动的参与：一般说来，人们参与的活动包括两类：其一，直接涉及小镇发展或开发的正式活动；其二，包括一般交往和消遣在内的非正式活动，参与这类活动有助于人们对小镇生活的体验和对小镇发展的了解，进而能够增强他们的社区归属感。

在特色小镇这种社区共同体的重塑过程中，文化再造的核心是培育具有创新特质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其基本特征可以用16个字来表达：崇尚冒险、宽容失败、激励众生、包容异端。在美国，诸多大学城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所以能够成为以创新和创造为基础的“新经济”的引擎，就在于“校园创造了新知识，反过来促进了校外高新技术的发展”。<sup>⑫</sup> 璩以硅谷为例，正是那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勇于创新 and 冒险、崇尚开拓进取以及敢于承受失败的精神，支撑着硅谷地区产业的推陈出新。<sup>⑬</sup> 璩在硅谷，人们通常认为初创公司不是技术公司，而是一部学习机器。硅谷的开放性则体现在该地区移民比例非常高，并且移民来源地多种多样。按《经济学人》前主编米克勒斯维特和其合作者伍德里奇的总结，硅谷创新文化中有10条原则：能者在上的公司信仰；对失败极度宽容的理念；对“背叛”的容忍态度；精诚合作的精神；嗜好冒险的行为；全新的投资理念；热衷改变自己的位置；对产品而不是金钱的痴迷；机会的慷慨分布；以及分享财富的强烈倾向。在这些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对失败甚至是变节的容忍度”。<sup>⑭</sup> 这些原则作为创新文化的价值形态，源于技术社会的群体创造，又反过来促进了高新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迅猛发展。这种创新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渐进过程中的充实性、群体社会广泛的认同性、以个人价值为主导的人文性、简单明了的可操作性和创新活动中的自觉性。创新文化与高新技术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不仅为硅谷信息技术产业乃至美国经济创造出无穷财富，而且还成为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学习借鉴的“模式”，并成为“硅谷人”这一文化现象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中国，特色小镇的创建刚刚开始起步，在这一轮建设中浙江走在了前列，将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与自己并驾齐驱的江苏抛到了身后。如果说杭州搭上了互联网经济的快车，带动整个杭州湾城市群以特色小镇为依托，凭借电商和互联网将产业的更新换

代推向潮头，那么，以 80 年代的乡镇企业和 90 年代的新加坡工业园驰名的苏南乃至整个江苏经济却仍然依靠传统的制造业蹒跚而行，竟使自己错失良机，甚至败在了自己曾一度遥遥领先的小城镇建设之上，其间的经验和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惟愿此番江苏的特色小镇和区域创新能够切实推进，与浙江共演一场引人注目的产业转型的“双推磨”，并使包括上海在内的整个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升级换代的动力引擎。

注：

①2014 年 10 月 17 日，云栖小镇举行首场阿里云开发者大会，在参观小镇的“梦想大道”后，省长李强鼓励说：“让杭州多一个美丽的小镇，天上多飘几朵创新‘彩云’”。这是第一次被提及“特色小镇”的概念。两周之后，在乌镇召开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李强又说：“小镇故事多，浙江将通过系列小镇建设，打造更有激情的创业生态系统”。

②③李强：《特色小镇是浙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经贸导刊》2016 年 2 月刊(上)。

③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浙政发 2015 年 8 号文。

④闵学勤：《精准治理背景下的特色小镇及其创建路径》，《同济大学学报》2016 年第 5 期。

⑤比如，作为众创空间的余杭梦想小镇启用后仅仅半年时间里，就吸引了 400 多个互联网创业团队、4400 多位年轻的创业者落户；紧接着，300 多亿元的风投基金接踵而至，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富有活力又完整无缺的互联网创业生态园，并名扬全球互联网领域。在那里，各类创业先锋营、学院和创业论坛、峰会和工作坊层出不穷(参见《众创空间——梦想小镇》，<http://www.dreamvillage.com.cn/dreamTown/college.htm?id=4>)。

⑥张鸿雁：《论特色小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中国名城》2017 年第 1 期。

⑦⑧李强：《在国家发改委深度讲解特色小镇》，<http://mt.sohu.com/20160902/n467388444.shtml>。

⑧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⑨据商务部《2016 国家开发区竞争力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2015 年底，我国共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66 家，开发区生产总值占全国 GDP 的比重约 1/4 左右(<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11-08/doc-iffxxmyuk6288678.shtml>)。

⑩李强：《在国家发改委深度讲解特色小镇》，<http://mt.sohu.com/20160902/n467388444.shtml>。

⑪⑫⑬周鲁耀、周功满：《从开发区到特色小镇：区域开发模式的新变化》，《城市发展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⑭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6 页。

⑮戈特迪纳、哈奇森：《新城市社会学》，黄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26 页。

⑯Hart, JohnFraser, 1988, “Small Towns and Manufacturing”, *Geographical Review*, Vol.78, No.3, pp.272-287.

⑰Peredo, AnaMaria & JamesJ.Chrisman, 2006, “Toward to A Theory of Community-Based Enterpris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31, No.2, pp.309-328.

⑮⑯⑰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创建江苏特色小镇的指导意见》,苏政发2016年176号文。

⑱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费孝通文集》第九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⑲Tan, K.C., 1986, “Small Towns in Chinese Urbanization”, Geographical Review, Vol.76, No.3, pp.265-275.

⑳Arif, BaburWasim, 2012, “Industrial Clusters, Schumpeterian Innovations and Entrepreneurs’ humanand Social Capital:A Survey of Literature”, Pakistan Economic and SocialReview, Vol.50, No.1, pp.71-95.

㉑周晓虹:《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㉒周鲁耀:《“统合治理”:地方政府经营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浙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㉓璩璩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㉔Vidich, ArthurJ. & JosephBensman, 1968, Small Town in Mass Society, Class, Power and Religionina Rural Community, Princeton, 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p.334.

㉕Weber, Max, 1958/1921, The City, Translated by D.Martendale & G.Neuwirth, NewYork:Free Press, p.81.

㉖Park, Robert, 1967, “The City as A Social Laboratory”, in Robert Park on Social Contro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Selected Paper(Edited by Ralph H.Turner),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3, p.11.

㉗周晓虹:《城市文化与城市性格的历练与再造: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关怀》,《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

㉘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6-507页。

㉙Florida, Richard,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 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Basic Books, p.292.

㉚高浏琛:《美国硅谷的创新文化》,《中外企业文化》2004年第4期。

㉛米克勒斯维特、伍尔德里奇:《公司的历史》,夏荷立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